



现实平静 网络世界的话语场却一直血雨腥风

◎李壮

# “优衣库”与“二次元”系统的话语狂欢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词语速生速死的时代。“优衣库”事件再次让我们见识到了这种惊人的速度：从深夜微博的突然引爆，到第二天刷爆微信群聊及朋友圈，紧接着网友的无穷智慧贡献出了数不胜数的衍生产品（古诗改编、图片拼接甚至主题文化衫等），直到在姗姗来迟的警方通报之中销声匿迹，最终像一尾发臭的干鱼那样不会再有任何人把它提起。从一个地理位置，变成一个具有特殊指涉性的“热词”，在词语狂欢中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奇葩想象，直到被更新奇的说法取代……“优衣库”代表了当下“词语制造系统”的基本套路之一。

当然，“优衣库”并不是我要谈论的对象，我想说的是“词语”。我们今天不断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知识话语的失效：文学语言、评论语言、学术语言渐渐失去同现实对话、呼应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思维的问题，更是词库的问题。我们的话语体系与实际的当代生活之间产生了脱节，这种脱节在“词语”层面体现得分外明显。社交平台 and 所谓“二次元世界”（动漫、游戏等虚拟世界，对应于我们现实中的三维空间）已经成为了当下最重要、最活跃、最具生产力的话语场域之一，但我们很多人显然对此缺乏了解。当下在精英话语场中占有最大话语权的往往是出身学院的资深知识分子，他们所惯用的词语来自于经典性的知识体系——即便80年代大量输入的西方概念在当时属于“他者”之列，它们仍来自于具有自身持续谱系的学院知识系统；在世界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的课本上，它们皆是有据可查。而今天铺天盖地而来的词语往往产生于互联网，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生事物，无论从生产机制还是传播方式来看，它们相对于当前的学术话语都是极其陌生的。

这种陌生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很多时候也会引发抗拒，但它确实贴合于当下的许多复杂的现实体验。例如“优衣库”为什么火？它的兴奋点显然不只在“色情”，网友们硬盘里的存货随便拿出1G，部部都会比“优衣库”劲爆得多。真正引发狂热的是空间场域的特殊性和对“三里屯”的标签式想象：试衣间作为公共空间里暂时性的私密场所，“性”在其中带有某种触犯禁忌的意味，它关涉到对当代青年人普遍疲倦的身心的重新挑逗；而“三里屯”作为“高富帅”猎艳的“木兰围场”和都市白领宣泄压力之所，本身会迅速地在“金钱”、“权力”和“性”之间建立起关联性的想象。同这两个方向相关的深度文章也很快见诸媒体：毛利在腾讯大家频道上发表了《床上的性早无趣味》，而《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旧文《三里屯：北京最孤独灵魂聚集地》也被翻了出来。

这就在文化层面上涉及了许多更

大的话题，例如青年心态。在西方世界，青年亚文化往往有具体的凝结对象，例如涂鸦，例如“朋克”文化的种种物化表征。但在当代中国，青年一代似乎过早地衰老了，他们在行为方式和生活节奏上受到了完美的规训，以至于很难在生命形态和具体行为上有所宣泄——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承担着过于沉重的房贷压力以及七姑八姨们过于期待的目光。因此他们的全部激素只能在虚拟的二次元世界中得到宣泄，唯一溢出虚拟世界边界的，就是这些烟花弹般有力而短命的词语。因此，现实世界尽管风平浪静，网络世界的话语场中却一直血雨腥风，其背后其实是颠扑不破的“能量守恒定律”：任何一种能量都不会凭空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改头换面地继续存在。

因此，每一次“话语狂欢”的背后都有自己的想象兴奋点。其中许多是肤浅的、无聊的，可以大致归入“语言垃圾”之列，我们大可一笑了之；然而还有一些，它们连通着一代青年人隐秘的羞涩与辛酸，它们的有效性掩藏在嬉皮笑脸的表象之下，如同一个个幽暗而疼痛的穴位。例如如今已被广泛接受并使用的“屌丝”一词，它在看似严丝合缝的政治话语系统中寻找一条隐秘的裂缝，借助“性隐喻”的方式打了一个擦边球，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阶层身份共名。现如今对这个词语的使用已经显得毫无新意可言，但它本身的发生学意义（它带有浓重的情色意味，恕我在此无法复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百度），无疑是一种对典型性时代情绪的反射，其间混合着自嘲、饥渴、无奈、压抑等多重意味，最终呈现为这样一幅化耻为荣、“自嗨”无限的怪诞面孔。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五四精神在大资本时代巨大压迫之下的变态标本：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民族劣根性这样的宏大话语过时以后，阿Q精神如何在新的权力秩序中获得了一种近乎绝望的合法性。与之类似的是“十动然拒”（女孩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他）、“然并卵”（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如果说“屌丝”是身份想象的产物，这两个词则指向现实中的行动效果。“屌丝”的不懈奋斗取得了“十动然拒”的结果，于是他终于明白，对自己来说，一切努力“然并卵”——这些令三维世界里的我们摸不着头脑的表达，若非要较真地翻译过来，不就是方那篇《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的故事吗？

当然，我的本意绝不是支持滥用网络词汇。对学术词汇系统的纯洁性、严肃性加以守护无疑是必要的。为追求所谓的“时髦”而过度使用一个词是毫无意义的。我曾在研讨会上见过一些老教授，他们口中频频蹦出“屌丝”一类的“潮”词，但整段发言的关键词却还是“引导”、“战斗”、“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

类的概念。这种反差造成了极其强烈的违和感。并不是说你穿上一条皮裤就能去三里屯泡吧了，你的上身至少不能穿着西服。真正重要的是要挖掘到词语皮囊背后的精神指向；至于形式上的使用，那倒是无所谓的事情。

李敬泽在一篇谈论中国儿童文学的文章中提到，现在形成了一种“大孩子写书给大孩子看”的局面。成年作家们之所以在此呈现出某种“缺席”，原因在于孩子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亚语言’，不是扮儿童腔就能应付过去的。”显然，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儿童文学领域。词汇系统和话语方式脱节的背后，其实是内心体验的脱节。“二次元世界”以其强大的词语更新能力和交互性，正在有力地塑造着一代人想象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语言对当下经验的附着和吸纳，已经大量地依托于这种想象和表达。我们无法想象“然并卵”这样的表达进入严肃的文学话语、评论话语，但也同样无法想象，我们能在对其全无了解的情况下下谈“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

如同布罗茨基所说，“每一个词都渴望返回它出发的地方，哪怕是作为一个回声”。他谈论的是诗歌，但这个表述同样适合于今天这些山洪般遍地流淌的“二次元”词汇。我们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追捧或者抗拒，而是要“循其本”、回到“它出发的地方”，去触摸那些朴素而永恒的原点。焦虑、孤独、苦闷……我们需要了解，面对这类经典命题，那些速生速死的词语是如何奇迹般地完成了当下性的阐释并迅速收获共鸣。尽管这种阐释在形式上只能在微博热词榜上存活几天，但在文化意味和精神体验上，它无疑是有效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体验本身就需要在词语不断加速的死亡快感中得到反复的、面孔各异的确证（就像那些频繁更换相貌近似女友的富二代所患的“集脸癖”一样）。而它们背后遥遥指向的那几个关键词，其实跟我们几千年思想史文学史上反复探讨的那些并无太大区别。

话语狂欢

二次元

十动然拒

然并卵

屌丝



# 香港书展 文化现场隔墙有耳

◎贾选凝



侯孝贤在香港书展上演讲

今年香港书展的主题很妙：“从香港阅读世界·一读钟情”，既有公共视野，又有私密情怀。说来惭愧，作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我对北京书展毫无感情，对香港书展却情结深重，见证着它年复一年将“书、阅读、文化”这些关键词变为整个夏天最滚烫的事。那么这种不断重复的热闹背后，它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

在大中华地区的书展中，香港独一无二。著名作家马家辉曾撰文指出，香港书展不仅是本土的阅读或“跟阅读有关”的文化活动，更早已成为两岸三地中的一个文化合作/交流平台。他认为“这个香港品牌的两岸威名绝不逊于繁星满目的电影展或时装周”。而香港书展的品牌效应，其实源于香港的独特地位——只不过书展最能让你直观感受到香港在两岸三地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就像个华文世界的天然磁场，吸引作家、读者、出版人以及各路文化界人士在一段特定时空中，聚在一起分享、讨论与发散。

所以香港书展的内容从来不只是买书卖书，更有讲座、读书会，以及更广义上的文化推广。单以今年最轰动的龙应台讲座为例，这位前台湾“文化部长”将她卸任公职后的首场公开演讲放在香港当然不是偶然，撇开她个人在香港住过八年的经历不谈，大抵上只有在香港，才会出现两岸三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各路读者挤爆一堂，三千人慕名来听一位具有分量的华人作家进行演讲这种盛况。置身那样的现场时，你感受到，她的思想具有力量。而香港，则为她的思想提供了开放的扩音场域——同样的演讲主题，关于“记忆”，关于两岸截然不同的历史诠释，放在台北书展，绝不会让这么多人听了心潮澎湃，最起码来自大陆的听众比例就不会这么高。

读过《野火集》的内地读者或许会有这种感受：隔着三十年时空，却仿佛从龙应台对台湾毫不留情的批评里，看到了许多相似的当下现实。而香港恰恰是个中转两岸时空落差的绝佳地方，因为百无禁忌，所以在这里更容易放下偏见。那些听完她演讲的年轻人，哪怕只记住一句“倾听你不赞成、不喜欢的人”，把这份心情带回去，并在漫长岁月中身体力行，就已是藉由书展所发生的无形改变。

相对于以版权贸易为主的北京书展，上海和台北书展近年都在尝试向香港书展的模式发展，增加沙龙、讲座、互动性的配套活动等等。尤其上海书展，这两年不但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服务贴心程度也值得一赞（至少香港书展可没有手机充电服务），思路则希望书香飘遍上海每个角落。但上海与香港之不同，是前者的高峰时段会让人微妙地产生某种“世博会”feel，而后者则更凝聚。

香港的“小”，体现在书展期间反而是优势，“文化现场”的感受会更直接。你不只可以在书展期间听到侯孝贤这种大咖讲座，还会发现两岸三地各路文化名人的踪影，隔墙有耳听听大家在讨论什么，就会很清楚当年书展哪些新作最有话题性。

熟人在这段时间空间里偶遇的几率也相当高，平日人人都忙，好不容易这两天来丰富一下精神世界，擦肩接踵低头不见抬头见，买书之外，聊天饮茶，互通有无，谈谈书叙叙旧，也是好的。那种凝聚感不只关乎于书、阅读话题和热点，更关乎阅读与人的关系。

对比一下台北书展，那可是出了名的“最美的风景是人的地方”，但“展会”的感觉却大于“人”，单是参与讲座的热度已低一大截。很难解释为什么香港书

展就是更有人间烟火气，但两岸三地人潮汹涌，无疑是它不可替代的优势。

而《亚洲周刊》每年策划的名作家讲座系列，则是提供一条脉络，让你去重新认识一些重要作家。像今年请来的季季、陈若曦、查建英，都不是以带来新书的面貌出现，而是透过分享他们的人生与历史/时代的交缠、介入，让我们懂得他们的写作所具有的意义。

不过，已经这么凝聚这么国际化的香港书展，在年度作家李欧梵看来似乎还可以做得更好。譬如他觉得书展该有旧书、绝版珍本和小众书籍，让爱书的人更“凝聚”。这倒相当言之在理，都市的蓬勃现代感之外，再加进一些vintage的层次，大概会更让书展的面向更宽广。

说回“一读钟情”这件事，如果在书展期间仔细留心一下香港地铁，会发现确实手里捧着书的人略有增长——这已经很不易，要知道平日大家可是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目不转睛的。读书这件事，当然不可能依靠书展就推动成全民风气，但至少，书展在每年炎夏，确实会把某种关于阅读的热情带回香港，甚至发散到更广阔的华人地区。书展的意义，其实也并不在于那个人声鼎沸且总被诟病为大卖场的购书现场，而在于它希望让人再次为“跟阅读有关”的事而兴奋。

所以“场域”的意义是重要的：一种令人兴奋的“文化现场”的效应，对阅读所带来的情感推动力，远远大于买三本打七折的促销价格。香港书展每年在重复做的，就是在一段有限的时空里，再度激发人们愿意去跟“书”跟“思想”碰撞出火花的那种热情。当一场书展能令你一次又一次想要参与其中、回到现场时，想来“阅读”的心情也已被记取。